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司马迁政治思想通论

朱枝富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

司馬遷政治思想通論

朱枝富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八月

第一章 司马迁与《史记》

第一节 司马迁的身世与发愤著书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称为“史学之父”。（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

司马迁所撰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人。他的生卒年，历史上没有准确的记载，不能十分确定。生年有两说，一是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中同意此说。二是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郭沫若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中赞成此说。目前仍无定论，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前说。其卒年也有多种说法，大致上卒于汉昭帝即位之初（公元前86年左右），享年约六十岁，一生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终始，正值西汉鼎盛时期。

一、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与《史记》产生的条件

秦始皇统一六国，完成了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宏伟事

业。他自命为“始皇帝”，要“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可历史好像要有意嘲弄他，历十四年而社稷为虚，二世而亡，赫赫一世的秦帝国崩于一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封建王朝。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刘邦、项羽同时起兵，可项羽暴虐，“汉行功德”、“扶义征伐”，夺得天下，建立了汉王朝。汉朝建立初期，国力衰竭，民疲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物价飞涨。汉初的统治者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汉高祖以及汉文帝、汉景帝几代的努力，政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即位和司马迁成长的时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出现了少有的和乐、繁华景象。司马迁津津乐道，是这样论述的：

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史记·律书》）

至今上即位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康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

不管司马迁夸张与否，汉兴以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是越来越好的，这是应当肯定的。汉武帝即位后，利用汉兴以来积聚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外用兵，南征北讨，拓边开疆；对内兴作，多所建树，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使西汉雄极一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到达了辉煌顶峰，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

时期。这一时期人们的斗志是高昂的，时代精神是向上的。而同时，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汲郑列传》）连年征伐，劳民伤财，百姓苦不堪言，特别是到了汉武帝的中后期，西汉王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一步一步走向衰败，以至出现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传》）的残败局面。

司马迁一生与汉武帝相终始，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一方面，他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昂扬向上，思欲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他对社会现实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在繁荣的背后隐盖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迹象，隐伏着种种矛盾和危机。如在《史记·平准书》中所写的经济富裕后，“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写酷吏如狼治羊，株连无辜，导致不少地方农民纷纷起义，等等。司马迁发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平准书》）的感叹。

司马迁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撰著了伟大的历史巨著《史记》，这决不是偶然的，而首先应当是时代的要求，而时代也为司马迁的撰史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首先，如何吸取亡秦教训，巩固汉王朝的统治，需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为统治者提供治政借鉴。秦王朝短命而亡，汉兴以后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热点问题。陆贾首先提出“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观点，著《新语》十二篇，总结亡秦教训，得到汉高祖刘邦的肯定。陆贾认为秦代“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刘邦据此确立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徭役不烦，刑法不滋，兵马少设，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尔后的惠帝、高后继续执行这一治国方针，“君臣俱欲休息于无为，天下晏然”，“民务稼穡，衣食滋殖”。文、景帝时，经济逐步发展，形势逐步发生变化，贾谊、贾山、晁错

等思想家们对如何“富安天下”，如何“成长治之业，建久安之势”，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探讨，提出了不少很好的主张，有些得到了统治者的采纳和应用。到了汉武帝即位后，旧的矛盾没有消除，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如何进一步巩固统治政权，更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善于用人，礼贤下士，积极鼓励人们出谋划策，董仲舒、公孙弘等人都以贤良对策，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亦以对策而被看重，汉武帝曾恨相见太晚也。生长在这一时代的人们都有一种建功立业的思想，司马迁当然也不例外，他以身为太史的特殊条件，通过撰著史书来回答长治久安的问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也就是要用历史事实说明如何治国安民的问题，这在《史记》中多有体现。可见，司马迁撰史，是时代的需要。

再说，西汉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司马迁撰史提供了必要条件。秦始皇实行愚民政策，焚灭诗书史记，不准民间读书、藏书，成了文人的劫难。汉兴以后，改秦之弊。萧何破秦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收秦图书，使之得以保存留传；早在汉惠帝四年，汉朝就废除了挟书律，奖励献书，提倡讲学，汉文帝曾派晁错到济南记录整理九十余岁老人的口授《尚书》；《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汉武帝即位后，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喟然而叹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武帝还下令：“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卫宏，《史记集解》引）这样，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乃父子相续纂其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主持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得以阅读秘籍图书，成为博学之士。司马迁撰史，在很大程度上参阅了大量古今图书，特别是先秦古籍，凡是汉代以前古书，无所不采。在《史记》中，司马迁亦多处说明。故有的学者研究，认为司马迁撰史

采纳古之图书达 216 种之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汉兴以来的文化发展和学术论著，司马迁是无论如何完成不了《史记》这一鸿篇巨著的。

二、司马迁的家世、壮游与出仕

司马迁颇为自豪地谈到他的家世，认为自己是传说的颛顼时代的掌管天地的重黎氏之后。重黎氏历经夏、商，世世代代职掌天地。到了周代，重黎氏后代有个封于程的伯爵名叫休甫的人，做了管军事的司马这个官，从此这一支就姓司马氏，后来司马氏一代一代职掌国史。到了周惠王、周襄王时，王室内乱，司马氏离开周王室到了晋国，分散在各个地方，在战国时出了不少名人。司马迁祖上这一支，公元前 621 年因晋室内乱而奔秦，迁居少梁。少梁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古梁国，附属于晋，公元前 641 年为秦穆公所灭，秦惠王十一年（公元前 327 年）改名夏阳，隋以后更名韩城。司马迁的祖上有个叫司马错的曾与秦惠王相张仪争论伐蜀，被委为伐蜀大将，攻下蜀国后做了那里的留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做了武安君白起的部将。司马靳和武安君在公元前 260 年打败长平军，坑杀降卒四十余万人，班师后，被赐死于杜邮。司马靳之孙司马昌，为秦朝的铁官；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做过汉朝长安的交易市长，司马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曾取得五大夫的爵位。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三代死后都埋葬在韩城华池西南的高门原。司马喜生司马谈，做了太史公。司马谈生司马迁。

司马迁谈及自己的身世，这样说道：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

射郢、崦；厄困郟、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一段介绍了司马迁年轻时代的经历。

司马迁生地龙门，是山名，横跨在黄河两岸，东段在山西省河津县北，西段在陕西省韩城市北约五十里。《韩城市志》中记载，黄河穿越龙门，“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传说每年暮春，有成千上万条鲤鱼激聚龙门山下，跳越龙门，跳上去就成龙升天。故有“鲤鱼跳龙门”之说。我曾在龙门考察，只见龙门上游河窄水急，而下游平坦开阔，龙门为黄河水之咽喉，水位上下悬差数尺，水激声响，十分壮观。司马迁实际生于韩城市南二十里的芝川镇，而自称生于龙门，是一概说，引以为豪。司马迁在乡间度过了美好的童年，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十岁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史籍。可见，司马迁从小就很聪明、好学。

司马迁十九岁的时候，即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司马迁一家也徙移到茂陵，属籍显武里。司马迁来到父亲身边。到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漫游旅行，面向社会作调查，了解和搜求古代、近现代历史传说故事及各种史料，求得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司马迁壮游的重点是在南方，其旅游路线大致是：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长江溯沅水到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至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的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

历史人物的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碭、睢阳至梁（今开封），回到长安。

司马迁的壮游是一次实际调查，接触了伟大祖国壮丽的河山和勤劳的人民。他“浮于湘、沅”，追寻屈原的足迹，思考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想着屈原的为人，禁不住悲伤流涕；在长沙凭吊了贾谊的遗迹，感到他的遭遇和屈原相似，十分同情；他“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搜集了关于五帝三王的古史传说，为他后来写《史记·五帝本纪》和《史记·夏本纪》作了准备。最值得称赞的是，司马迁在淮北对近现代史作了深入细致的寻访调查，取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如陈涉少时为人佣耕有鸿鹄之志的慨叹，樊哙屠狗，曹参为狱掾，萧何为主吏，张良之下邳，陈平为社宰，周勃织薄曲，韩信贫居葬母高敞地、漂母寄食，刘邦好酒及色等。司马迁通过游历考察，弄清了许多历史事件，大至秦始皇的破魏战争，小至战国时的一个城门名字，其它如有关人物遗事、民间歌谣俚语等都作了记载，对山川地理、古今战争，都了如胸中。司马迁壮游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司马迁入仕以后，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司马迁奉使西南夷主要是传达汉武帝征西南夷之令，参与征略活动，巡视当地的社会治安与风情，对西南夷的社会、经济、政治、民风习俗等作了真实的记录。

后来，司马迁曾多次扈从汉武帝巡游郡县，主要有：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侍从汉武帝至甘泉，当年汉武帝在甘泉置“寿宫神君”；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侍从汉武帝至三河地区，这是汉武帝即位以来第一次巡行三河地区，观察民风；元鼎五年侍从汉武帝西巡，西登空同，北出萧关，《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汉武帝“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元鼎六年侍从汉武帝东巡，“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

县。”（《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夏，侍从汉武帝封禅及北巡。“东巡海上”，“登封泰山，降坐明堂”。司马迁在这次侍从之初，见父于河洛之间，聆听遗嘱，然后继续从行。元封二年侍从汉武帝负薪塞宣房，等等。

司马迁的壮游、奉使、巡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开阔了眼界。司马迁的足迹所至，约汉朝时的大半国土，在游历中不仅关心汉朝，还注意到了匈奴、西南夷，写下了当时具有世界史性质的著作；不仅注意政治与军事，还体察到各个地区的交通与经济；二是增长了才干，通过游历、参观、访问，作社会调查，具有广薄的学识，如多次扈从汉武帝封禅祠神，通过体察，由表及里，明白了真相；三是理解了社会，不仅懂得社会人情与道德的准则，而且明白了社会生活与等级的真谛，知道了社会有贫富之分，人人求富争利，但只有少数人能致富起来，大部分人仍然守贫；四是在游历中抚今思昔，陶冶了高尚的爱国爱民的情操。总之，通过游历，提高了司马迁的为人品格和学术修养，吸取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的营养，真正成就了不朽的名山事业，使《史记》成为独具一格，“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对此，历代不少人予以评论。

苏辙认为司马迁通过游历，使文章“疏荡”，“有奇气”，其云：

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马存与友人谈到周游天下的阅历对司马迁性情的陶冶和形成多种多样文章风格的影响，有一段精彩的议论，其云：

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

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生平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江，泝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陂，彭蠡之渊，涵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嶷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蔓绰约，春妆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情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嗜啜，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万兵马，大弓长戟，交集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慄；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哉。（陆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

顾炎武认为司马迁通过游历，“心中固有一天下大势”，其云：

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

事实上也正如此，司马迁游历全国，饱览了祖国许多名山大川，对社会风俗、人情风貌有着深厚的感受，从而使他的文章雄浑雅

健，逸气纵横，在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

司马迁的入仕，其年代不详。他二十岁壮游，后从孔安国问故，其入仕，根据王国维的考定，时间大约在元狩二年至元鼎四年（公元前121—113年）之间。其年三十岁左右。

司马迁仕为郎中，其秩比三百石，是最低级的小官。汉朝的郎官系统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级。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郎官无定员，可多至上千人，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为皇帝侍从，郎官积资外迁，往往得为长史，出守地方为令长，是仕进的阶梯，平常亲近皇帝，所以亦感到很荣耀。

司马迁仕为郎中后，常随汉武帝左右，得到汉武帝的信任。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起，汉武帝巡行郡县、祭祀五帝、东巡封禅，司马迁常为侍从。

到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迁三十六岁，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太史令司马谈作为顾问随从东行，但到洛阳就病倒了。正当这时司马迁奉使归来，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留下了遗言含恨而去。司马迁守丧三年后，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任为太史令，其时司马迁三十八岁。

太史令是皇帝身边最重要的历史顾问，重大制度的兴废和典礼仪式均有太史令参加讨论。司马迁为太史令的第五年，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了新历，定名太初历。改历是封禅活动的继续。封禅象征新王朝受命于天地，改历象征受命的完成。这是划时代的壮举，司马迁躬逢其时，参与其事，激动不已。太初历颁布后的第七年，到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司马迁遭受了李陵案的株连，被下狱受腐刑。出狱后，被任为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身边的秘书，被视为“尊宠任职”。在司马迁完成了《史记》的撰述后，即悄然归去，其卒年无法确定，大致和汉武帝相终始。

三、司马迁的遭祸与发愤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正当司马迁的撰史工作进入高潮而“草创未就”时，突然飞来横祸，因为李陵辩护而被下狱受腐刑。

李陵是汉武帝时名将李广的孙子，少为进章监，骑射技术有祖父李广之风，谦待下士，甚得战士欢心。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

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识，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报任安书》）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北行三十天，直达浚稽山，吸引匈奴单于的注意力，保证贰师将军的出击成功。李陵的担子很重，汉武帝又派老将路博德率领骑兵一万为他的后援。李陵长驱直入，到达目的地后派陈步乐回朝廷报告。汉武帝十分高兴，朝中大臣无不举杯祝贺。接着，孤军深入的李陵却遭到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重兵包围。匈奴骑兵从三万增加到八万。李陵率领步卒且战且退，经过十几天的激战，歼敌一万多，但终因寡不敌众，在离边塞仅有一百里的地方，全军覆没，李陵被匈奴捉去。而老将路博德耻为李陵后援，坐视不救。贰师将军李广利是一个庸材，是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所以汉武帝把重兵交给他。在太初年间，李广利征兵大宛，拜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这次出征匈奴，汉武帝想让李广利立功增封，但这个庸将率领的三万骑兵未遇匈奴主力，却被打得大败亏输，损兵折将而返。汉武帝见两路兵败，食不甘味，听朝不怡。那些阿谀逢迎的人，讳言贰师之败，全委过于李陵。司马迁对此十分气愤，认为这是极不公平的。当汉武帝召问群臣的时候，司马迁挺

身而出，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报任安书》）

而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李陵游说，便翻脸不认人，把司马迁囚禁起来。后来，汉武帝又误听传言，说李陵替匈奴练兵，把李陵全家抄斩，连无辜的老母也被推上刑场，司马迁也因此遭受腐刑。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其初衷应当是正确的，他是为了宽汉武帝的心，“效其款款之愚”，并“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司马迁曾说自己“少负不羁之材，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他很感激汉武帝的恩宠，一心想报答主上，因此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但是，司马迁为李陵陈情后，汉武帝并不领情，说司马迁是“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指为“诬上”。（以上见《报任安书》）这一方面表现了汉武帝的武断、专横，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司马迁这个封建士大夫的正直，具有敢于批评时政的精神。

司马迁入狱以后，过去的那种一心想亲媚于主上的心情没有了，他所考虑的是如何对待生死去就的问题。他认为，在这时而死，是毫无意义的，其云：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能与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报任安书》）

基于此，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从司马迁当时的状况来看，如果引决自裁，则死比鸿毛还轻。他想到历史上一些王侯将相，忍辱苟全，成就其业，给了他活下来的力量。他要完成历史巨著，因而甘愿受辱，“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自请腐刑，“就极刑而无愠色”。

司马迁经过对生与死的反复权衡，懂得人生的意义，坚强地活了下来，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书。他从古代名士身上吸取了无穷的力量。他说：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安书》）

司马迁引古人自况，意在表明自己要发愤著书，通过著书来偿前辱之债，这样虽被万戮而无悔。

司马迁发愤著书，使体现在《史记》中的思想得到新的升华，所著史书更加光彩夺目。司马迁为李陵辩护，遭受腐刑后，其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一心想亲媚于主上，而受刑后则自以为“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在史书中发扬了批判精神，同情人民的苦难，揭露了专制主义的黑暗。司马迁遭祸下狱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圜圜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对世态炎凉、人情市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史书中秉笔直书，揭露酷吏的残忍专横以及朝臣的互相攻讦、落井下石等丑恶行为。换言之，司

马迁遭受李陵之祸后，树立了卓越的生死观，深化了对封建道德与法律的认识，更加珍惜生命的价值，发愤著书，寄希望于“来者”。包世臣对《报任安书》一文发表过这样的意见：

窃谓“推贤荐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非素相善，尚力为引教，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艺舟双楫·复石菴州书》）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是遭受了一场最沉痛的惨祸，却带来了最为积极的成果，所谓遭祸发愤，玉成于《史记》。对此，后之评论者认为：

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发愤作《史记》一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材。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踞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贾谊，词旨抑扬，悲而不伤，亦近代之伟才。（葛洪：《西京杂记》卷四）

余读《太史公自序》而知《史记》一书，实发愤之所为作。其传李广而辍以李蔡之得封，则悲其数奇不遇，即太史公之自序也；……即进而屈原、贾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痛哭流涕而长叹息，亦其自序也。更进而伯夷积仁洁行而饿死，进而颜子好学而早夭，皆其自序也。……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诚不禁其击碎唾壶拔剑斫地慷慨而悲歌也。……嗟乎为之，读史至《史记》，读《史记》至此，有不为之拍案叫绝度

书而之叹也哉！（袁文典《永昌府文选》卷一二《读史记》）

这些是从正面来评价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认为司马迁发愤著书使《史记》增添了光彩，得到了新的升华，亦可看出司马迁是一代之伟才。而诋毁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亦大有人在。如班固时的汉章帝就说：

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隐刑

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典引》）

统治者对此恨之入骨。后汉王允甚至叫嚷：“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传》）把《史记》指为“谤书”，从另一方面说明司马迁的批判精神，说明司马迁在《史记》史揭露了封建社会中的专制弊端。宋朝张耒亦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予以批评。他说：

司马迁作《伯夷列传》，言“非公正不发愤而遭祸灾”，此特迁自言为李陵辩而武帝刑之耳。论管、晏之事，则于晏子独曰“使晏子而在，虽执鞭所忻慕焉”，迁之为是言者，盖晏子出越石父于縲继，而方迁被刑，汉之公卿无为迁言，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为汉与否未可知，而迁犹激昂不顾，出力辩之如此，几于愚乎！与夫时然后言，片言解纷者异矣。不知其失，而惑乎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时人之不援己于祸，而拳拳于晏子，迁亦浅矣，迁亦浅矣！（《张右史文集》卷五六《司马迁论》）

张耒的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对司马迁的一种偏见，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论。

司马迁自请腐刑，出狱后，任为中书令，被视为“尊宠任职”，但司马迁对此则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便一心一意忍辱著书，献身于《史记》，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史书，这是值得我们景仰的。